

高 教 动 态

总第 23 期 2012 年第 4 期

嘉兴学院发展规划处 主办

2012 年 12 月 20 日

本 期 要 目

● 高教动态

回眸 2012 精彩教育语录盘点：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1

● 校长著述

香港大学校长谈人才培养：教出不落伍的学生 24

北大周其凤校长演讲实录：北大文化与北大精神 26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高教内涵发展的时代要求 33

● 专家观点

谢维和：高等学校的三种入学形式

——从高考制度改革的“兼顾原则”及其变量说起 35

熊丙奇：不要辜负学生对教改的信心 39

“处长辞官从教”：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开启 41

● 高教动态

回眸 2012 精彩教育语录盘点：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编者按：2012 年，举世瞩目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航母出海、莫言获得诺奖，多少大事将彪炳史册。2012，又有多少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着网民和他们的心。无论他们身处哪里，无论他们是伟大或者是平凡，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那些声音，总激励我们、鼓舞我们，传递着“正能量”，令我们振奋前行。新华教育特集结文字，回首二零一二那些难忘的教育声音。本篇小编特集结了校长、教育界名人论教育的名句，以飨读者。

===校长寄语：大学为理想而生存===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没有一流哲学家思想家就成不了强国”



我曾经对我们的学生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但如果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

想家，那么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起因之一。

人文教育：构建和谐未来世界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人文教育区别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承担着怎样的功能？目前高校人文教育的状况如何？复旦大学自7年前实施的通识教育力图做怎样的探索？

为此，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听他讲述他眼中的高校人文教育。

记者：您觉得人文教育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杨玉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共同居住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称其为“地球村”；然而人们的“眼界”却远未提升到相应的高度。由于人的本能和恰当的教育结果，人们习惯于将任何不同于自己同族的思想与行为视为“异类”，从而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并成为打压其他文化，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国际资源的思想基础。

我个人认为，当世界只有一种文明和文化存在时，这种非多元文化的世界将是人类的末日。因此，我们中国人提出，各种文明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种不同文明和文化和谐共存的世界格局。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受教育者去严肃地思考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的未来世界才是我们所期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应是本着这样的期待去研究通向这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可能途径。因此，让大学里的受教育者去了解、理解、宽容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并使他们具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

记者：结合新世纪的发展情况，您觉得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日益凸显了还是日渐衰落了？

杨玉良：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我要强调，仅仅“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思想”。社会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样都是“双刃剑”。在“工具理性”思维的驱使下，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毁灭人类的武器，也可以制造危害人类的“金融风暴”。

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更需要“思想”，更需要加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

近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人类近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 20 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纪里，将“知识的时代”转化为“思想的时代”，即成为一个一流思想家和哲学家辈出的时代。

我曾经对我们的学生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但如果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育的重要起因之一。

记者：我们了解到，复旦大学在 7 年前开始实施通识教育，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杨玉良：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会注意到，政府最近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措施来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性的思维，为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人的发展提供精神与价值的选择。这是我们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张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体悟。

我对中国近 30 年来的发展做过如下的粗略概括：在第一个 10 年，大家认为我们要发展技术，因为我们要有能力自己制造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等，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在第二个 10 年中，人们意识到技术的源头在基础科学，所以我们设立了 NSFC（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第三个 10 年中，人们才发现人文与社会科学也是重要的，但客观上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管理、法律……）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最近对人文学科和文化建设的重视是因中国现时的社会和世界格局的状况中所逼出来的。

我这里指的“人们”不仅仅是学者们，也包括普通百姓和政治家们。作为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复旦大学较早地认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从 3 年前开始就启动了“复旦大学人文振兴计划”，并将其作为国内外汉学经典的研究和交流平台；成立了“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和“复旦发展研究院”来开展社会转型、制度建设和治理形态的研究，目的是服务国家决策并期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智库，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提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为此，复旦大学的“985”三期投入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上的经费达到了“985”二期费用的 6.5 倍以上。

为什么要建立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我们的考虑是基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我的认识而言，植根于古希腊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的西方文化以“人本主义”、“分析”与“逻辑”见强；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受近代中国“救亡”的形势所逼迫，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综合”和“悟性”的思维方式为特征，其具有各自的优点和适用性。当今世界所面对的诸多重大问题都极其复杂，或许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据糅合了东西方文化之所长的思维方式。最近，复旦大学

与英国的丁铎尔全球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复旦—丁铎尔全球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我们期望这个“中心”能够成为集东西方思维方式来研究与解决全球乃至全人类的复杂问题的典范。

来源：人民日报 2012 年 11 月 16 日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大学生要勇于迈出第一步”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大学生也要有正确的就业观念。”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如果第一份工作起薪就要 1 万元，那找工作确实是难，因为这不是社会上错了，是大学生自己错了。

“同学们要敢于迈出就业的第一步，就业之初做什么工作，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龚克说，“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未必一辈子做这个工作，不要把起点看得那么重。很多大学生没就业，就是总在犹豫看有没有更好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择业方向，龚克推荐第一步迈向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重点地区和重要部门。

浙大、南开、哈工大校长聚焦“硕士当城管”

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不久前有消息称，12 名硕士研究生当上了城管队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记者在两会上采访了三位来自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

校长杨卫、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让他们把脉剖析这一现象，同时为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指明方向。

王树国：缩小行业待遇差别

“硕士研究生去当城管是因为公务员的待遇好，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如果各行各业都有这样待遇，大学生将会有更多的选择。”

王树国指出，高校本身很关心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但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有些高校关心的还不够。

“没听说哪所学校因为就业不好影响了招生，招生、就业本来应该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却越来越淡化，管理链条断了。”王树国说，“如果是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就要倒闭。因此，要让学校的服务对象决定其生死，大学生就业难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我国的科技也才能更好的发展。”

这位校长同时指出，中长期的科学研究需要更稳定、踏实的氛围，不能急功近利。

“而我们目前的每一项科研，要想得到经费支持都要有明确的近期目标。”王树国说，“这样的话，很难培养出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大师。”

龚克：大学生要勇于迈出第一步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大学生也要有正确的就业观念。”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如果第一份工作起薪就要1万元，那找工作确实是难，因为这不是社会上错了，是大学生自己错了。

“同学们要敢于迈出就业的第一步，就业之初做什么工作，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龚克说，“现在做什么工作，未必一辈子做这个工作，不要把起点看得那么重。很多大学生没就业，就是总在犹豫看有没有更好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择业方向，龚克推荐第一步迈向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重点地区和重要部门。

“如果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比较好的起步平台。”龚克说，“至于在具体的岗位、起薪的收入，都是次要的选择。”

杨卫：不能要求大学生毕业就“上手”

“很多跨过公司的研发基地在本国，而销售、生产、制造基地在中国，所以要求员工来了就能上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说，“我们当然需要技师，但也要着手培养层次更高的人才。”

杨卫指出，高校也应该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不能所有的都来培养技师，也不能有所的都去培养博士。“在计划经济时代，学生按岗位要求学习，自然上手快。”杨卫说，“在市场经济中，未来的岗位不能确定，怎么可能要求学生学的都是‘有用的’？”

“经过通识教育阶段的人才具有更平衡的知识结构和更强的再学习能力，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杨卫说。

来源： 新华网 2012 年 03 月 07 日

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马云在谈创业时的一句话很适合解释刘道玉在武大的经历：“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刘道玉就是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重重地跌倒了。他的一些学生说，看到刘道玉，让人想起夸父、愚公。愚公命好一点，感动了两个神仙帮他把大山搬走；而夸父则牺牲在追逐太阳的路上。

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教育改革的“出头鸟”

“啊？你说什么？声音请稍微再大一点！”面容清癯的刘道玉侧着头，用右手附着右耳大声说道。

4 月 22 日，由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研讨会为期一天，年近八旬的刘道玉在会场认认真真地端坐了一天。无人知道，右耳已失聪多年的他究

竟听清楚了多少发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只要在瞬间凝望一下这位紧锁眉头、面部神情严峻而忧郁的老人，一种尊敬、感动与痛惜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便油然而生。

再有几个个月，刘道玉将正式进入他生命的第八十个年轮。他的学生和朋友早早开始串联，想筹办一个别具一格的祝寿活动向这位“永远的校长”表示敬意。但刘道玉婉言谢绝了。盘旋在他脑海里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在 80 岁之际再动笔写一本题为《理想大学》的新书，“作为这一生的收官之作”。

从 1977 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与向邓小平建言“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开始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历程中，刘道玉命运坎坷，起起伏伏，但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话题。

教育改革的“出头鸟”

刘道玉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是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的幸运。

1981 年 8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一条带有黑色电头的消息：

经中央批准，48 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 48 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个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经济特区在沿海地区创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胡耀邦总书记“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

被冠以全国最年轻校长之名的刘道玉没有辜负这改革的时代。他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为改革动力，在教学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等，使武汉大学一时间成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当年许多的改革创新之举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谈到他那个时期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由此可以理解刘道玉为什么被武大学生称为“永远的校长”。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

历史总是经常会表现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1988年春节前夕，年仅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宣布因年龄原因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职务。本想大干一场的改革者一时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刘道玉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教育的追求。

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立志进行教育的刘道玉，已看明白了体制内的公办学校没有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不可能出现理想的试验田，因而谢绝了去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任职的机会，一方面开始腾出精力来撰写他计划已久的“创造教育三部曲”，一方面把目光投向民办教育。

1994年，刚刚写完自述——《生命六十始》不久的刘道玉，怀着一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喜悦之情，出任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

有人奇怪，一个堂堂的大学校长为什么要转过身来做小学校长。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苏联一个流行说法曾深深地影响了刘道玉。出于对教育家的崇拜，对改革事业的向往，他在《办学情怀》中抒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试验田”。教育改革，成了刘道玉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

为了倍加呵护这块试验田，刘道玉将自己从社会中募得的15万元交给学校，还赠送了800本个人藏书和收集的20多本各国精美的画册给校图书室。这期间刘道玉教育的最大收获就是“创造教育三部曲”的出版。《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谈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是他在武汉大学10年教育的理论总结，同时他还把创造课直接开进了中学生的课堂。

摔倒了，爬起来还要往前走

2001年夏季的一天，在好心学生的暗中帮助下，刘道玉夫妇从武大校园悄悄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紫菘公寓一套尚未装修的毛坯房。夫妻俩与世隔绝，终日只能相对而坐，境况极为凄凉。

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来避难的。2000年底的一天，由于投资人私自携款潜逃，办学近6年、已具相当规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被迫关门了。接着，数十名学生家长到学校要求退还学费，时常还有上门讨债的汽车直接就停在他们家门口。

刘道玉上当受骗了！在学校最后一次教师和干部会议上，心情沉重的他当着大家的面失声痛哭，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他所承担的

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也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他的身体，也因为两次住院、两次开刀变得每况愈下。有人评论说，刘道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在年近古稀之时遭到暴风雨般重创的刘道玉还能何为？

虽九死而不悔的刘道玉没有倒下。2005 年秋天，在位于北京长安街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携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刘道玉，受到了武汉大学在京学生最热烈、最热情、最隆重的欢迎。

这本自传的写作，大体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此时的刘道玉由于疾病的困扰，不仅写作进度缓慢，而且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脑梗塞的后遗症，使得他右手写字颤抖，必须着力方可使字形可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以积极的进取心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不仅用心为自己写传，还用心给他的学生写传，题为《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实践与理念》一书在国内外出版。

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为批评者

公办教育体制不愿再碰，民办教育改革实验夭折，过了人生七十这道坎后，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事业似乎已暗淡渺茫，历史注定不会给他机会了。

热爱教育、钟情教育的刘道玉不因年龄而止步，他很快实现了新的转型，由当年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变成为教育改革的评论者和批评者，开始用思想和声音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

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风雨变幻。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关于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问题、关于怎样根治大学学术腐败的问题、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等众多重大问题，刘道玉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教育家的专业眼光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经《南方周末》发表后，上百家网站转载，网友评论 5000 多条。媒体的调查问卷表明，90% 的人支持意见书，这广泛唤起了人们的教育改革意识。

2011 年 4 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有必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的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道玉再一次以教育改革家的形象赢得社会的尊重。

勾画心中的《理想大学》

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致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刘道玉这样表明心迹：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仍没有消失。于是，准备积个人 30 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教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两天，刘道玉关于《理想大学》的写作提纲已经修改了第三稿，雏形已见。这份写作提纲，让人们看到一个至死不渝的教育改革者的最高理想。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

马云在谈创业时的一句话很适合解释刘道玉在武大的经历：“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刘道玉就是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重重地跌倒了。

他的一些学生说，看到刘道玉，让人想起夸父、愚公。愚公命好一点，感动了两个神仙帮他把大山搬走；而夸父则牺牲在追逐太阳的路上。

有人说，刘道玉是个悲剧性人物，钟情改革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人说，刘道玉是过时的人物，不甘寂寞不过是为了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而对于年事已高、几乎丧失听力的刘道玉来说，闲言碎语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眼前即将动笔的凝结自己教育改革教训与心得的《理想大学》！刘道玉心里很清楚，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所以，他想到写出自己和身边教育资深人士的理想大学。正如司马迁形容《史记》，可藏诸名山五百年，等待后人的发现。《理想大学》是他给自己暮年生活的一份礼物，是留给当代人的遥远曙光，更是留给未来，曾经的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不屈追寻的历史背影。 记者 贺延光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2年05月03日

华中科大校长“根叔”：教授被称为‘叫兽’这是教育的悲哀



根叔表示，学术诚信、腐败校长等问题时有发生，但不少人将个别问题普遍化，不经调查便随意炮轰。“把抨击教育当成了时髦，俨然成了社会问题。”“按理说，教育和医疗，本来应该是崇高而令人敬畏的职业，但前不久哈尔滨有个医生被杀了，绝大部分人说杀得好；大学里的教授，也被网友们纷纷冠以‘叫兽’的字眼，这是不是缺乏对人起码的尊重？也凸显出对教育起码的敬畏？”

“根叔”：教授被称为‘叫兽’这是教育的悲哀

“根叔”到南开中学交流

教授被人随意称为“叫兽”，人人都把抨击教育当成了时髦，全国名牌高校的一把手享受副部级待遇……

说到上述怪相，银发“根叔”又皱起了眉头。“根叔”是谁？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两年前，他用这句话给该校 7700 余名应届毕业生作毕业致辞，随后这句话传遍全国大专院校和中小学；从此，根叔成了他的代名词。

昨日下午，根叔作客重庆南开中学，与该校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我看中国高等教育”的讲座交流。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 主要观点

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人人都把抨击教育当成了时髦，这也是教育的悲哀。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要求听话。

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

看一所学校怎样，就要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敢不敢、可不可以批评校长！

■ 教育金字塔

自由

发展

创造力

德智体美

有文化

爱国家、拥护社会主义

“现在教育家很多，但都不在大学，而在民间”

当根叔挥手走进南开中学大礼堂时，会场顿时响起了掌声。落座前，年过花甲的他先毕恭毕敬地向台下所有“95后”行了一个鞠躬礼——其谦逊和蔼的作风，再次赢得会场掌声。

讲座一开始，根叔就语出惊人：“现在教育家很多，但都不在大学，倒是民间有很多真知灼见。”他说，这也是他愿意到中学与师生交流的原因。随后，他表示，现在社会上对教育多是批评，很多批评也不乏真知灼见，但似乎缺少理性的批判。

“教育最高层次：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做自己”

教育应该培养出怎样的学生、怎样的人？“教育的最高层次：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做自己。”根叔道出了自己的标准。根叔把教育和对学生的期望，做出了“金字塔”式的注解——最底层：爱国家、拥护社会主义，这是起码的要求；第二层，有文化；进一步：德智体美；再进一步：创造力。最高要求：自由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是什么？“缺乏教育的内在理想、缺乏求是的动力、全靠指标驱动，缺少批判质疑的文化和文化的批判。”“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要求听话；到了小学中学，还是要求听话，甚至到了大学，依然如此。”根叔直言不讳表示：“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被行政化，上面的管理部门太多了。”

“以前我们是厅级，很多部门不把你放在眼里”

但根叔也表明了自己的另一个态度，目前的网络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得政府、社会乃至师生，都对教育缺乏应有的敬畏。“这也是教育的悲哀。”

根叔表示，学术诚信、腐败校长等问题时有发生，但不少人将个别问题普遍化，不经调查便随意炮轰。“把抨击教育当成了时髦，俨然成了社会问题。”“按理说，教育和医疗，本来应该是崇高而令人敬畏的职业，但前不久哈尔滨有个医生被杀了，绝大部分人说杀得好；大学里的教授，也被网友们纷纷冠以‘叫兽’的字眼，这是不是缺乏对人起码的尊重？也凸显出对教育起码的敬畏？”

“不仅如此，你们知道吗？中国排名前列的30多所高校，书记校长都是副部级——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也是！”根叔此语一出，引来全场一阵哄笑；但他没有笑，而是一脸真诚严肃地讲开了：“大学校长其实是不需要给级别的；以前我们是厅级，但到部里、省里办事，很多部门都不把你放在眼里，导致很多事情难办；后来，是国家考虑到某种现实，才把这30多所名校领导集体提升了级别。”根叔坦言，自从“级别”提升后，的确被人另眼相看，办事享受到了更多方便。但没有级

别，工作就真的难以开展吗？”（首席记者 朱昕勤 记者 贺怀湘 实习生 袁夏岚 摄影报道）

● 交流互动

问题 1

学生：现在的教育其实就是面向高考，导致很多学生的创造力都被抹杀了；请问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才选拔制度才是符合中国国情？

根叔：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有些人建议取消高考。我是人大代表，有人跟我说了，但我要讲，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取消高考必是灾难，那是引起社会极度不公平的灾难。但是不取消高考，完全维持现状，又不能解决问题，有什么办法？有些学校就想出自主招生——坦率地讲，味道也变了。本来自招生的初衷是好的，我们意识到不能完全看学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方面，但是变味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整个社会大环境诚信严重不足。

我曾经有过想法，和几所好的学校，联合搞试验田，从高一到高三，我们派人跟踪，如果有若干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养都不错，那不用高考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学校就读。但具体操作的人会执行得怎样呢？执行得不好会不会也变味？我不敢说。毕竟我不能亲自跟踪，有时候我也很困惑，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的话，可以跟我说。

问题 2

学生：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更潇洒？

根叔：首先精神上必须解脱出来，精神不解脱你怎么潇洒得了。同学们这个潇洒，是读自己有兴趣、想读的书，而不是被迫的、完全功利化的。一定要从精神上解脱出来，这点做不到，就没有潇洒可言。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你同样用很多时间读书，你的内心也是很潇洒的。

● 新闻面对面

教授、校长、根叔 最后一个名字最响亮

记者：前不久，江苏某高二学生在全校升旗仪式上丢掉演讲稿抨击教育现状，对此，您有何看法？华中科技大学会欢迎这样的学生吗？

根叔：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学生。至于他批判得对不对，是肤浅还是深刻，我想这和他的阅历及知识面紧密相联；当然，我们不能强求一个高中学生就能把这么复杂的教育制度问题说得很到位。但他显示出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潜力，我们当然欢迎这样有思想和主见的学生，而且更应关注的是对这种孩子如何更好的培养，促成其更好的发展。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上，你在人大分组讨论及自我介绍时，强调的都是“教授李培根”，而非“校长李培根”；那么请问校长、教授、副部级官员、甚至“根叔”，这几个角色，在您的工作和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比重各是怎样？

根叔：我不反对“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但我更渴望看到自己在身处相应角色时，能真正做点什么——教师教授，是我长期从事的工作事业，理应最为看重并陪伴终身；校长，则相对是一个短暂职务；至于因此享受的副部级待遇，虽然的确为我的工作和学校发展带来便利和实惠，但从根本和长远看，我依然认为这是现行中国教育的无奈，去“级别化”、去“行政化”、尽可能回归教育精神本质。至于“根叔”的称谓，就是学生们亲切的叫法，没想到传播得最广的，反而是这个名字。

来源： 重庆晚报 2012 年 04 月 26 日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卓越校长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当前，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关起门来办学校、当校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校长要想成为卓越校长，成为有远见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和未来的眼光，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已发展到什么水平，要了解世界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知己知彼，才能知道个人要如何发展，朝哪个方向使劲；自己的学校改革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我们的培训，就是要给学员们搭建一个看中国、看世界的平台。

刘彭芝：双卓基地为助推优秀校长成长开辟一条新路

2012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市第三期普教系统双名工程刘彭芝卓越校长培养基地暨中国基础

教育卓越校长卓越教师培养基地（简称双卓基地）第二期校长班启动仪式上，国务院参事、人大附中校长、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会长刘彭芝在讲话中指出，自 2009 年创办中国卓越校长、卓越教师培养基地以来，一直本着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引领，以中外一流学校常态的办学实践为依托，以人大附中的创新发展为典型案例，研究卓越校长、卓越教师的成长规律，创造出“异地培养、适时集中，多向交流，突出实训，个人自主学习、导师定期指导”的培训模式，为助推优秀校长成长为教育家开辟了一条新路，积累了一些经验。刘校长对第二期校长班学员提出了三点要求，强调一个“实”字，旨在为各位校长搭建了一个中外学校、国内不同省市、不同类型学校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以下为刘彭芝校长讲话的全文：

尊敬的国务院参事陈进玉主任，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程天权书记，尊敬的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司长，尊敬的上海市教委李骏修副主任，北京市教委罗洁副主任，尊敬的各地区教委领导，各位学员、尊敬的各位国外友好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们、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教育同仁，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金秋十月，“上海市第三期普教系统双名工程刘彭芝卓越校长培养基地第二期校长培训暨双卓基地第二期校长班”正式开课了。作为基地主持人，首先，让我向来自上海、北京、新疆、山东、贵州的 83 名校长学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这些省市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特别是上海市教委，为此次培训所作的大量准备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百忙中莅临今天启动仪式的教育部、上海市教委、北京市教委……等各级领导，表示衷心感谢！对远道而来的外国同仁，以及新闻媒体和各界朋友，一并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这个基地自 2009 年创办以来，一直本着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引领，以中外一流学校常态的办学实践为依托，以人大附中的创新发展为典型案例，研究卓越校长、卓越教师的成长规律，创造出“异地培养、适时集中，多向交流，突出实训，个人自主学习、导师定期指导”的培训模式，为助推优秀校长成长为教育家开辟了一条新路，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上一期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完成了 6 次集中培训，总计 35 天 350 学时，来自上海、北京、云南、新疆等 20 多个省市地区的上百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参加了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前，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关起门来办学校、当校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校长要想成为卓越校长，成为有远见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和未来的眼光，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已发展到什么水平，要了解世界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知己知彼，才能知道个人要如何发展，朝哪个方向使劲；自己的学校改革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我们的培训，就是要给学员们搭建一个看中国、看世界的平台。

正是基于此，我们这次培训主要安排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国际一流学校的办学特色和经

验，包括：美国托马斯杰斐逊理科高中校长、伊利诺伊理科高中校长、芬兰埃肯纳斯学校、韩国韩亚中学校长的报告；以及来自美国、爱尔兰、芬兰、意大利、丹麦五国教师代表的报告；还特别邀请了爱尔兰、芬兰、意大利、丹麦四国学生代表介绍自己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是人大附中教育创新之路系列报告续篇，包括：“道德教育创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教育均衡”几个板块。希望这些内容能对大家开阔视野、启发思路、深入思考、创新实践有所裨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温家宝总理也几次提出“需要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我个人认为，由一个普通校长成长为教育家型的校长，需要一个不断反思、积淀、成长的过程，其间既要有外力的助推，更需要个人执著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借此机会，我向参加本期培训的学员提出几点希望：

1、各位学员都来自教育一线，我知道当校长日常工作都非常繁忙，百务缠身，但还是希望大家挤出时间、投入精力，保质保量地完成本期培训的各项任务。因为从个人长远发展来看，培训学习实际上是让校长们能够跳出日常管理的圈子，站在更高层次反思自己、办好学校的加油站，所谓事半功倍、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中小学校长的学习培训，不是为了说、不是为了摆花架子，而是为了做，为了扎扎实实地办好学校，所以，关键要注重一个“实”字。希望大家：培训学习的时候，要带着实际问题；借鉴他人经验的时候，要结合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要立足办学实效。有了这个“实”字，相信我们的培训一定会有收获。

3、我们这个基地，实际上给各位校长搭建了一个中外学校、国内不同省市、不同类型学校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孔夫子有言：三人行则必有我师。那么，对每个学员个人来说，其他学员可能都是你的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多学习、多交流、广交朋友，充分合作，使这种友谊和合作在时间、空间上得到更大的扩展延伸；让基地这个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这个培训基地设在人大附中，也给我们学校、给我们全校教职员工提供了一个向国内外优秀校长、教师学习交流的好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多给人大附中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预祝本期培训圆满成功！祝各位学员在北京度过充愉快的学习时光！（陈达）

来源： 新华教育 2012 年 10 月 26 日

===2012 年度热门人物和他们的教育观===

莫言：“作家影响作家 根本在灵魂深处的相似”



莫言直言，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两位大师给了他重要启发，但他最终发现风格不符还是选择了“逃离”。“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莫言演讲中的“名言警句”：文学创作必须独断专行

当地时间 12 月 6 日中午，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亮相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瑞典学院出席诺奖得主新闻发布会。这是莫言获奖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首次公开亮相。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讲故事的人”。演讲中，莫言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定义为“讲故事”的过程。

“20 多年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

莫言回忆道，他起初的创作之路并不平坦，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作家影响作家 根本在灵魂深处的相似”

莫言直言，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两位大师给了他重要启发，但他最终发现风格不符还是选择了“逃离”。“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创作必须和个人经验相结合”

莫言表示，不管小说起源于梦境或是发端于现实生活，但最终都必须和个人经验相结合。“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小说家写作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

莫言表示，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不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来源： 中国新闻网 2012 年 12 月 08 日

李嘉诚：“人最大的悲哀是无聊 未来跟明天是两回事”



李嘉诚说，“人最大的悲哀是无聊，患上漠不关心的冷淡症，套上自命不凡的枷锁，在专业、行业 and 权力的高岗上，掌控庞大社会资源和机会，却失去自重心，那些沉醉在过往，滞留在今日，那些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借口大王，一定被社会唾弃和淘汰。”

他认为，有能力的人，要为人谋幸福，这是任务。历史中有很多具有创意、有抱负的人和群体，同心合力，在追求无我中，推动社会改革进步。天地之间有一不可衡量、永恒价值的元素，只有具使命感的人才能享有。

李嘉诚：人最大的悲哀是无聊 未来跟明天是两回事

11月22日，香港长江实业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在北京出席长江商学院成立十周年庆典。

“我14岁那年，一位会看相的同乡对我母亲说：你儿子眼眸无神，骨架瘦弱，未来恐难成大器。他安分守己，终日乾乾，勉强谋生是可以的，但飞黄腾达，怕没有他的福分！”当李嘉诚缓缓走上讲台，台下掌声雷动。面对后辈新学，这位华人最知名的企业家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这是长江商学院10周年庆典的现场。虽然凭借着高超的运作手段，长江商学院迅速崛起，跻身世界顶级商学院前列，但是“俱乐部门”、“明星集中营”亦令其深陷舆论漩涡。此刻，作为“金主”，李嘉诚似乎认为有必要重申企业家的使命感，以为长江商学院提振精神。该院正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支持而得以兴办。

李嘉诚接着说：“我妈妈刚刚失去丈夫不久，这番话令她多心酸。妈妈把失望放在一旁，安慰和鼓励我，说：‘阿诚！天命难算，上天一定会厚待善良、努力的人。再艰难，只要一家人相依一起就不错啦。’我当然相信母亲，但我更相信自己！我请妈妈放心，我内心相信，只有自己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唯一能信任的命运。”

豪言易出，英雄难觅。彼时的李嘉诚身在战乱、父亲病故、贫穷三重合奏的悲歌中，抬头望天，亦不免忧愁。只是心中的信念如火光照前：建立更好的自己，才能建立更好的未来。

李嘉诚认为，未来跟明天是两回事，天命和命运是不同的。明天只是新的一天，而未来是自己在一生各种偶然性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追求自我，努力改善自己是一股正面的驱动力，当你把思维、想象和行动谱成乐章，在科技、人文、商业无限机会中实践自我；知识、责任感和目标融汇成智慧，天命不一定是命运的蓝图。”他说。

来上长江商学院的人很少有宿命论者。他们多是昂扬进取之士。李嘉诚的话自是说到他们心坎儿上了。他的成功和荣耀亦令众人痴狂。

不过，李嘉诚话锋一转，问道：“你成功追求自我，前途光明远大，你下一阶段的追求是什么？你的价值取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今天依然活在悲惨、孤寂、贫病的绝望之谷，承担社会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义务？”

台下默然。在当今中国，追求成功，拼命挣钱，已经不需要鼓励。然而，成功之后的生活却常常令人困扰。不少富豪感到，当钱不成为问题时，生活本身却没有了意义。

李嘉诚说，“人最大的悲哀是无聊，患上漠不关心的冷淡症，套上自命不凡的枷锁，在专业、行业 and 权力的高岗上，掌控庞大社会资源和机会，却失去自重心，那些沉醉在过往，滞留在今日，

那些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借口大王，一定被社会唾弃和淘汰。”

他认为，有能力的人，要为人谋幸福，这是任务。历史中有很多具有创意、有抱负的人和群体，同心合力，在追求无我中，推动社会改革进步。天地之间有一不可衡量、永恒价值的元素，只有具使命感的人才能享有。

这是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却并非人人做得到。李嘉诚回顾过往，认为无愧于心——那个同乡看不起、瘦弱、无神的少年，一直凭努力和自信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他希望，长江商学院的学子不一定做拯救世界的英雄，却一定要“谨守正知、正行、正念，应该可以高声回应社会：我们一生未曾不仁不义、不善不正”。

这是李嘉诚一贯的想法。多年以前，他是以“赚钱的艺术”的演讲拉开长江商学院的序幕的，却最终以“奉献的艺术”做结。显然，他觉得，“善其身，济天下”的古老情怀该是长江商学院的建院之基。非为如此，不能成就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成就一个更好的商学院。

“我盼望，为下一代建立和守望未来，是每一位长江商学院同学的承诺，让我们一起共勉，同塑更美好的世界，世代代能在尊严、自由和快乐中，活出我们民族的精彩。”他最后说。（记者 董伟）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12 年 11 月 26 日

白岩松：新学校要变为“心学校”



此前几天，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北京十一学校举行的新学校论坛上，与俞敏洪一样看到

了来自基层的力量，他面对 1500 多名中小学校长，鼓励他们：归根到底，未来的中国在各位、未来的中国在教育、未来的中国就在于由旧学校变成新学校，由新学校变成我们最喜欢的心灵塑造的学校。

2007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兰蕙公寓一间小会议室里，李希贵与 30 多位校长启动了新学校行动研究，“把你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我们的行动”。它确定“从学校的问题出发”，探寻师生抱怨背后的原因，围绕校长、教师、课程、文化、管理等领域，寻求建设理想学校之道。

没有师生的幸福，哪来理想的教育？

培养幸福感首先要减负

在“新教育”与“新学校”行动的参与者之中，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致力于培养老师们在学校的“幸福感”，这是值得庆幸与期待的变化。

在第三届新学校论坛上，深圳云顶学校的杨坚校长分享了他如何凝聚人心涣散的教师队伍的做法。他们坚持为老师办生日宴；在逢年过节短信问候离职的教师，欢迎他们与学校再续前缘；大张旗鼓地把教师节的红包送到每个老师手中；在中秋节给老师们的父母寄月饼，等等。从云顶学校这两年流行的几句话中，或许可以窥见该校的文化：什么是校风？校长作风就是校风。什么叫主任？主要承担责任，简称主任。什么叫组长？组织大家成长，简称组长。

江苏省无锡市蠡园中学校长邱华国，从教 20 年，已做了 10 年校长，面对当今教育的诸多怪现状，他的态度经历了这些变化：从痛而避之，到视而不见，到嘲讽批判，到追问思考，再到孜孜建设。作为一名新学校的行动者，其“匹夫之志”是“立足本校，系统创新，改善教育”。最近，这位深受会海困扰的校长所做的努力是，把“教师大会”变成“教师智汇”，他认为，会议改变，学校就会改变。

一个多月前，温家宝总理提出，当前迫切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学校。新教育所致力四大改变中，包括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学生的生存状态和学校的发展模式。但对于深受迎来送往、各种指令、检查评比之苦的中小学校而言，解放之路漫长而崎岖。

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的赵翠娟校长以减负谋求解放。她在新学校论坛上说，近 20 年来，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令人应接不暇的理论、教学法、办学模式和研究课题，这些是需要删减的。“如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为了这些东西，以及它们背后的利益奔跑，学校和孩子们的人生就成了跑马场”。

其次，需要删减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带给学校的压力。“一级又一级、一层又一层，各个科室都下发文件、布置任务，如果我们都按照他们的去做，就不能干正经事。”赵校长通常的做法，是坦诚地表示“做不过来、请原谅”，如推脱不了，就“耍点小聪明”。比如她让一些老师设置了一种表格，一种活页，一种图表，“有很大的通用性，填写起来很容易”，迎接各种检查，并屡获好评。

赵翠娟还在学校的德育中做减法，减去很多大话和空话。她说，孩子们迟早会发现，那些话原来都是骗人的，会导致他们对真道德的不信任和对谎言的麻木。“这样的事我们宁愿不做，只是静悄悄地看着他们成长”。

2010 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南马路小学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做了重要批示，受省委省政府的邀请，赵校长带领 43 名老师对厅级以上干部作了一场报告。随后，许多政府部门的约请接踵而至，赵校长全部婉言谢绝，其中包括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这位 63 岁的校长说，因为这会影响孩子们上课和学校的正常运转。

她理想中的新学校，善做减法，也善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即符合教育规律的行为。她认为，学校应该是引发师生学习的地方，建设一支终身学习的教师队伍才是治学根本。“我做校长 18 年，这件事做了整整 18 年。”她谦虚表示，“我 18 年好像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这位一心躬耕教育的校长，在她 55 岁时，组织要任命她为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她竟然急得大哭了一场。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来源：新华教育 2012 年 12 月 17 日

● 校长著述

香港大学校长谈人才培养：教出不落伍的学生

成立于 1911 年的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作为一所享誉世界的顶尖学府，在 21 世纪更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身为国际知名遗传学家的徐立之，担任港大校长的十年间，以科学家的务实精神，立足亚洲，放眼天下，坚持管理需与时俱进。他带领港大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始终紧跟时代变革的步伐。

徐立之校长近日接受人民网专访，就治校精神、人才培养侃侃而谈，言语间也透露着港大跻身一流大学的秘诀。

谈治校精神——“明德格物” 指引港大追求卓越

香港大学的校园里，“明德格物”的校训标识随处可见，在徐立之的办公室里，记者也看到校训的标牌。其意在训勉学生追求真理，彰显德性。虽然现在高等教育所处环境正经历着一些变化，新知识的开拓与新科学的构建，以及全球化的加剧，使得港大必须不断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顺应时势革新发展。但百年间，这句古人遗训就像一盏不灭明灯，指引着港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明德格物’出自《礼记·大学》，这句话虽然是古人留下的，但到今天也很适用，不仅仅是港大，对所有大学都很有用。格物致知是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要去追求履行的一点，只有拥有渊博的学识，不断探索真理，才能彰显我们与生俱来的良好品德与智慧。”徐立之说。

谈声望排名——务实办学 不刻意追求排名

“正如人的品德无法以单一的量化数据来代表，港大也拒绝将高校排名视作绝对且唯一的衡量标准。”徐立之说。

在由英国一家高校资讯咨询机构（QS）公布的最新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香港大学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 23 位。但是这些排名数字却并非港大所追求的，徐立之告诉记者，“对待名次，港大始终保持着平常心，我们很高兴看到出色的成绩，但报告中所列出的优劣势分析才是更重要的参考，这些信息对港大是一种警示，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与提升各方面素质。”

“面对各种大学排行的诱惑，港大绝不选择为了名次而投机取巧。”在徐立之看来，只有坚持务实的态度，杜绝刻意炒作，专注于师资、文献、科研成果等才是办学根本。也正是这种低调务实的理念，使得港大在不同的全球范围高校排名中都能名列前茅，体现出其真实可信的综合实力。

谈内地招生——“高考状元”并非唯一招生指标

香港回归 15 年来，港大在招收内地学生的也逐年增多。从最早的一年 30 人名额到今年的 360 多人，实现 10 余倍的数字增长，不仅为内地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求学机遇，也使港大吸纳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达到了双赢。

然而，近年来，内地不少省市的“高考状元”放弃内地顶尖学府入读港大，对此，徐立之称：“港大希望能招收到优秀的学生，而‘高考状元’只代表了一项出色指标，但港大绝对不是只收状元。和内地大学相比，港大在教学上有着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直以来推行的‘全人’教育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组织、判断、沟通、应对能力，所以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谈人才培养——教出不落伍的学生

如何培养顶尖卓越的人才？历年来，“钱学森之问”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于破解之道，徐立之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培育人才应以学生为本，所以从课程设置上和学习方法上港大都首先考虑学生的看法，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目标进行安排。如果学生在前两年的学习过程中转变了兴趣，还可以更改专业，给予了极高的自由度。同时，港大老师也不仅是教授课本上的知识，而是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希望学生能在课余时间，通过更多的实践积累经验，丰富学识。

时代在变，港大也在随之而变，用徐立之的话说，“改革是没有止境的”。2012 年起，香港政府把大学学制从三年改成四年，这是一次教学上的重大革新，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徐立之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大学得以配合学制改革，革新课程，贯彻港大“全人”教育的培育理念。他说：“这次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 3+1=4，多出了一年时间，而是就课程进行了全新的编排。由前两年开始，所有学生不分文理工商，都要修读科学与科技，人文科学，环球议题，和中国文化、国家与社会等按四大范畴设计的核心课程，一方面巩固基础，同时扩展知识层面；从三年级开始，再专攻各自的科目以及各种实习，学校会留足够时间给他们去接触社会，学习一些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另外，学校还会提供一些到内地或海外不同院校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在四年的时间里能够充分增长见识、拓宽眼界，争取培养更多的卓越型人才。”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时代发展变化的速度有时让人措手不及，因此港大在这次教学改革中，也从根本上改进了教学方法。徐立之介绍说，港大正在推行一种体验式学习，让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激发兴趣，真正成为学习上的主角。老师将对待学习的态度传授下去，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样即使课本上的知识有落伍的一天，掌握了方法的学生也绝不会落伍于时代。（原标题：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谈“钱学森之问” 如何培养卓越人才）

来源：人民网 2012-12-11

北大周其凤校长演讲实录：北大文化与北大精神

周其凤 汉族，1947 年 10 月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常委、副主任，教育部化学和化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演讲人：周其凤

时 间：11 月 16 日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有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和紧迫感，又要牢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切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把精力放在管根本、管长远的基础性工作上，始终保持深刻的定见和强大的定力，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跟风。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文化建设就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各类量化的评价指标则为工具性的作用。循本而求用，则用之不竭；以用取代本，虽能喧嚣一时，终难行远。中国的大学能否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以什么样的面貌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究竟能在世界一流行列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最终还是要看文化建设的成效。

以文化来推动大学建设

世界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第四次重大变革，就是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重新以文化统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防止大学变成单纯的科研工具和商业场所。

古往今来，大到文明兴衰，小到团体消长，无一不是以文化因素为根本推力和根本原因。任何社会和社会中的任何部分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自觉推进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对于大学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性，既体现在文化对于大学的意义，也体现在大学对于文化的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的大学来讲，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紧迫。

这种紧迫性，体现在世界高等教育回归文化本质的发展新趋向所提出的新课题。近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深刻变革，第一次是从宗教教育机构转变成通识教育机构；第二次是从教育

机构发展成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机构，标志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第三次是走向产学研相结合，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大学的崛起；现在，世界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第四次重大变革，就是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重新以文化统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防止大学变成单纯的科研工具和商业场所，以文化确立大学在社会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如果说前几次变革中国的大学都是后发者、追随者，那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次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同步者，甚至还有可能、有条件成为引领者。机遇已经到来，机遇稍纵即逝，我们理应抓住机遇而不错失机遇。

这种紧迫性，体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这个重大任务。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大学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党和国家把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四项基本职能之一，就是要求大学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大学要肩负好这个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则是西学东渐、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已形成一百多年，要重塑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根基，不容易；二则是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文化日益多元多样，要在差异中重树共识，在多元多样中再立主导，更不容易。我们将交上一张怎样的答卷？国家在期待，人民在期盼，世界在瞩目。

这种紧迫性，体现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推进大学科学发展提出的新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大学的外部办学环境、内部治理方式和师生的思想特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大学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只有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凝聚全体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精神认同，激发他们的爱校荣校意识，更加自觉地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发展；才能更好地彰显大学的文化风格，塑造大学的文化品牌，提高大学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为大学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有形资源 and 无形支持；才能更好地明确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办学体制，为大学科学发展提供深刻的思想文化资源，使大学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什么是北大精神？

深刻的文化自觉、博大的文化关怀、高远的文化追求一直在北大生生不息。

大学文化建设的重点是着力培育大学精神，把大学精神贯穿到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和教师、学生、干部、后勤等各个群体。

人无精神不立，校无精神不兴。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文化上的旗帜，在全体师生员工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抓住了大学精神建设，就抓住了大学文化建设的制高点。

对待大学精神，一要传承，二要发展。所谓发展，就是要不断地赋予大学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不断地对大学的发展历史和精神体系形成新的体会和认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初步的共识，就是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来

概括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现在来看，这四个词还是比较有准确性和适应性的。近年来，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常为新的姿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内涵，使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在此过程中，也进一步深化了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的认识，对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的基本特征作出了新的概括。

首先，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有着志存高远的特质。

北京大学创立于清末维新运动时期，是中华民族兴学图强的产物。从创办至今，深刻的文化自觉、博大的文化关怀、高远的文化追求一直在北大生生不息。

最早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就提出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要把大学堂办成“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的理念。

民国初年，严复在《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中，进一步提出了北大应当肩负的恢宏使命：“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发出与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平行之发展”的强烈愿望，并按照“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和“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理念，在北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西南联大期间，北大与兄弟高校一起，抱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信念，弦歌不辍，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人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据统计，1949年到1965年的北大毕业生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已达100多人。

上世纪80年代，北大学生率先喊出了“团结中华，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近年来，北大师生按照中央的要求，集中精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学校综合办学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面向未来，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热爱祖国、服务社会、造福人民、胸怀天下的崇高情怀和远大理想，始终把个人发展、学校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人民幸福，甚至与全人类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做一个有追求、有品位、有责任、有担当、有献身精神的人，办一所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和尊敬的大学。

第二，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有着醇厚绵长的特质。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积淀的过程。有人说，如果说政治改革需要6个月，经济改革需要6年，文化改革至少需要60年。大学文化也是这样，必须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作为源泉和支撑。北大的历史非常醇厚，从而使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具有博大精深、厚积薄发的重要品质。

110 多年来，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戊戌变法时期，是北大精神的孕育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五四时期，即北大精神的形成时期。第三时期是北大精神的发展时期，即新中国成立时期。今天北大人所坚持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和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繁荣学术，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理念，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用心血和行动支撑起来的。每一项传统和理念背后，都有数不清的动人篇章。就像谢冕教授曾在《一百年的青春》中写道：“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历史、更来自历史的漫长行进中形成的北大精神。”

第三，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有着海纳百川的特质。

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海纳百川的特点是由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和综合、多元、均衡的学科结构决定的。

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在北大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闻名遐迩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根本方针，在于强调大学以学术为本，学术以自由为本。这一办学方针的实施，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从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传统在北大牢固地确立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所讲的“兼容并包”，并不是良莠不分，而是要允许不同学术派别、学术观点的争论和争鸣，为新文化战胜腐朽、落后的文化提供条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真实含义是尊重学术，倡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允许自由探索真理，坚持真理。

从上世纪 50 年代，马寅初老校长在面对不合理的批判时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学者在社会主义股份制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勇敢无畏的探索，都充分体现了北大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鼓励人们自由探索、勇开新风的精神传统。

如果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确立了北大海纳百川的精神品质，那么，北大综合、多元、均衡的学科结构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精神品质。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在北大，一个院系或许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院系；但却似乎没有一个院系敢说自己是北大最好的院系。这充分反映了北大学科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作为一定观念意义上的文化，都一定是社会事实、社会基础的反映。北大学科结构的这种特点，使北大文化不像有的学校那样，由一个或某几个学科占据强势的主导地位。因此，北大的院系之间、学科之间、师生之间必须学会互相尊重和包容，平等交流和对话。这也是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一直延续着海纳百川的精神品质的重要原因。

第四，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有着与时俱进的特质。

纵观北大的诞生、成长和发展，都与改革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鲁迅先生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同样地，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也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常为新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重要品质。

今天，一些人对北大精神传统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北大文化蜕化了，北大精神失落了。那么，北大文化和北大精神究竟是封闭僵化了、蜕化失落了？还是与时俱进、生机盎然？这是北大文化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我们应当承认目前北大的确存在一些与北大优秀文化传统不相符、不相称的现象，并出现了极少数“害群之马”。同时，北大文化建设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北大文化的主流是好的，北大师生整体精神风貌是昂扬向上、充满朝气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在北大生生不息、不断发展，每一种精神都有许多生动的事例，有力的证明。

以爱国精神为例，近年来，许多北大毕业生自愿去西部、基层、农村就业。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学校毕业生赴西部、农村、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总人数就将近 800 人，涌现出一批扎根西部、奉献基层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如“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莫锋，光荣当选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村官陈丽娟，主动放弃读博和在北京大医院工作的机会，而选择了重庆市开县人民医院担任住院医师的朱兴旺，等等。

以进步精神为例，近年来，学校在师资人事制度、学科建设、教育改革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重要改革，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不断取得显著成绩。从 2002 年至 2012 年，北大进入世界前百分之一的学科从 4 个增加到 18 个，居国内首位。今年六月，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又制定了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进而走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宏伟目标。这些都充分说明，北大人永不停滞，永不僵化，永不自满，不断追求进步，追求卓越，追求一流。

以民主精神为例，近年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民主精神在北大得到了很好的坚持、贯彻和发展。对于一所大学来讲，民主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的学术民主精神。在北大，学术民主主要体现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传统。今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在北大得到了认真贯彻。学校始终坚持中央提出的“学术探索无禁区，课堂教学有纪律”的原则，在学术研究、学术探索、学术思考上不设定任何框框，不禁止任何实事求是的独立的正常的学术研究，提倡一切认真负责、言之有据、理性平和的学术表达，保护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争鸣。当然，学校也会坚决制止和反对不负责任、不计社会影响的公开言论，这并不是违背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恰恰是从根本上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

进一步来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在今天的北大不仅得到了坚持，更得到了极大发展。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根基是一种互相尊重和宽容的精神。胡适先生曾讲：“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当然，毫无原则的宽容和容忍也是不当的，对于践踏基本社会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为，一定要坚决反对和斗争。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宽容精神总是比不宽容更为难得。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从各国文化经典中找到了一条最基本的伦理共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原则，就是充分表达了人类应当互相宽容、互相尊重的精神。

与此相对照，今天的北大的确是极大地发展了作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根基的互相尊重和宽容的精神。比如，在今天的北大，对于卫生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等重要问题，都有不同观点和热烈争论，但这种分歧和争论，多数都是正常的学术探讨，对于帮助党和政府科学决策、防止政策的片面性起到了有益作用，也没有影响教师之间的团结。又比如，北京大学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北京论坛，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倡导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充分反映了北大人提倡互相尊重和宽容精神的实践，已经从一所学校的内部，走向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再比如，这次党的十八大正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北京大学自2009年起就与相关单位共同举办了连续四届贵阳生态文明会议，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实际上也是把相互尊重的精神，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事例，无疑都是今天的北大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极大发展。

以科学精神为例，近年来，北京大学着力推进师德、学风、学术道德规范建设，成效显著。进一步形成了潜心育人、严谨治学的风气，涌现出王选、孟二冬、姜伯驹三个全国性师德典范和一大批先进典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迄今18位得主中，有8位是北大教师或校友；2011年“两院”院士评选，北大有6人当选，是当选人数最多的高校；截至2011年，北京大学已有36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居高校首位，体现出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最近一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北大获奖成果总数达59项，高出第二名27项。

总之，我们一定要把传承和发展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在传承和发展大学精神的过程中一定要增强文化自信，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今后如何创建北大文化？

世界一流大学，最根本的是质量内涵一流、教风学风一流、精神文化一流。

首先，要建立健全文化建设规划和协调体系。

当前，我们对文化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对新形势下文化的地位、作用，对新时期大学文化建设的规律性特点都有待深入认识。同时，大学文化建设虽然形态丰富、亮点纷呈，但仍然普遍比较分散，缺乏整合机制，发展不平衡，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师德、学风等突出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这些都需要加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文化建设工作体制和机制。

要牢固树立文化无处不在、文化建设人人有责、文化建设融入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管理服务全过程的大文化建设观，反对把文化建设界定为个别部门和单位的事情的片面倾向，每一个部门、院系、单位，每一个学科、教研室、实验室，每一个党团组织、班级、团体，每一位北大人，都是文化建设的主体，都有文化建设的责任。

要健全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院系分工负责、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规划编制、政策制定、经费安排、资源配置、宣传引导等方面对文化建设给予全方位支持，形成学校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第二，要大力倡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扬大学传统、特色鲜明、贴近实际、示范引领的价值理念。

一流大学有崇高精神追求方成气象，有先进文化引领方有灵魂。世界一流大学，最根本的是质量内涵一流、教风学风一流、精神文化一流。当前，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进入了重质量、重内涵、重文化引领的新阶段，随着我们在办学条件、设施设备、科研成果等外延方面不断逼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人才、制度、文化、质量、效益等内涵方面的建设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对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研究，树立先进的办学理念，珍惜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弘扬高尚进取的大学精神。

文化建设既要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抓起。各院系、各部门都应当结合实际，从教师、学生、干部、后勤不同群体的特点出发，凝炼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准则，倡导和培育有特色的先进文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精神文化条件。

第三，要坚持正面宣传和加强管理两手抓，进一步纯洁校园文化氛围。

一手抓典型示范，一手抓制度管理，是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不断发现和宣传师生先进典型，大力倡导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风教风和清除庸品、拒绝平庸的学风，倡导清正廉洁、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党风政风，倡导文明生活、健康成才的发展理念。

同时，要高度重视、认真解决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严肃处理个别害群之马，培育风清气正的校园思想道德环境，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校园文化。

第四，要切实履行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推进一些重点文化建设项目。

文化建设既是贯穿在学校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全局性工作，也需要一定的项目和载体；既要润物无声，也应当有声有色。要着力推进一些重点工作，着力构建大学文化建设长效机制。例如，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找准服务国家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和结合点；推动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加强师德师风和医德医风建设；建设人文校园、和谐校园、绿色校园；积极倡导文明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新风尚；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等等。

我们坚信，当代中国的大学一定会在文化建设上，书写无愧于历史和先贤的新辉煌；一定能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大潮中，开辟中国气派、中国底蕴、中国格调的文化新风；一定能以文化建设上的鲜明成效，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民族心愿筑就圆梦的坦途！

来源：光明日报 2012 年 12 月 11 日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

高教内涵发展的时代要求

刘川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提高质量是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任务。质量问题是世界各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 2002 年的 15% 提高到 2011 年的 26.9%。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根据测算，2020 年，我国高中教育的适龄人口将从目前的 1.23 亿下降到 8700 万人，保持现有招生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可以提高到 34%，达到 40% 只需再增加 6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公办高校原则上将不扩大规模。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任教师从 1998 年的 40 万人发展到 2010 年的 134 万人，增加了 2.35 倍，而在校学生数从 1998 年的 340 万人发展到 2010 年的 2232 万人，增加了 5.56 倍，专任教师的增长速度只是学生增长速度的一半。目前，我国已是高等教育大国，“大而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后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从规模扩张转到质量提升。

优化结构是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八大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与国家需求相比，高校在学术组织结构、招生结构、学科专业设置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距，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不完善，社会各方面尤其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机制不完善、动力不足，人才培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需要。高校必须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把握重大产业工程、科技创新工程等需求，推进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着力加强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创新模式是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世界各国都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教育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如美国的一些大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日本高校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和“工业实验室为主”的教育模式。我国在世界创新体系中仍处于赶超阶段，必须锐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加快教与学的变革，尤其要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显示，56.9%的学生认为网络对学习影响较大或非常大。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必须以学习者为中心，改革教育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充分吸纳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充分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潜力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坚持开放办学，提升人才培养层次，增加学生海外学习和实习的机会，扩大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

对北师大来说，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双重使命，即培养创新型教师和创新型学科人才。多年来，北师大坚持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开阔的国际视野、勇于实践的创新型人才，推进“4+X”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构建了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和多元化教师培养模式。今年是北师大建校110周年，学校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确立了质量立校工程，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北师大将积极推进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为契机，推行厚基础、强能力、本研衔接的拔尖学生培养模式。整合教师教育资源，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形成包括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紧密衔接的卓越教师培养体系，努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2年11月30日

● 专家观点

谢维和：高等学校的三种入学形式 ——从高考制度改革的“兼顾原则”及其变量说起

编者按：12月，进入普通高考报名阶段，与高考相关的问题再度渐入人们的视野。自2011年9月以来，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在中国教育报先后刊发文章，提出高中教育的新定位问题，引发教育界讨论。为此，本版开设“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系列谈”，并催生了5月12日中国教育报理论文化中心和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新时期高中教育定位与发展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这一讨论引发人们越来越深入地研究高中教育相关问题，其中，高考改革不可回避，它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谢维和从高中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大学入学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路 and 看法。高考改革的推进，必将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重要贡献。

→目前高考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失调，没有与时俱进地体现高考制度的“兼顾原则”。

→所谓“兼顾原则”，指的是高等学校的入学形式与高考制度应该“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特点与诉求。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和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则是这种“兼顾变量”的两个基本变量。

→高等学校应该根据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发展变化的实际，建立和形成申请入学、考试入学与推荐入学三种入学形式。

■ 谢维和

高考必须有，也必须改，这是客观事实，问题是如何改革？高考制度的历史功绩与改革成就不容否定，但随着发展而出现的问题与弊端也成了教育改革的难题。我认为，目前高考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失调，没有与时俱进地体现高考制度的“兼顾原则”，主要表现在中

等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及其相关评价结果在高考制度中受到忽视或弱化，被边缘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考制度的变形。高等学校的三种入学形式的设想正是根据这种“兼顾原则”及其变量的变化而提出的。

高考制度改革的“兼顾原则”

从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考试招生制度（以下简称“高考制度”），是一个覆盖高考制度中所涉及的各种相关活动与因素，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系统，包括高中教育及其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高中的推荐、大学入学的报名与考试，考试的命题与判卷以及大学的招生与录取，考生及其家庭的参与等活动或因素的系统或综合，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的体系。高考制度是否合理，往往取决于这些相关因素与规范之间的协调程度与整合方式。高考制度之所以受到批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协调与整合出现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高校与高中之间的关系。所谓“兼顾原则”，正是协调与整合这些因素和规范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它指的是高校入学形式与高考制度应该“兼顾”高考活动中的各种利益相关因素，而不能有所偏颇或者失衡，能够充分顾及各个方面的利益与诉求。具体地说，这种“兼顾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指，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家与考生的利益诉求，高校入学形式及高考制度应该科学适当地实现系统内高中教育因素与高等教育因素之间的协调，以及两者的政策与特点的统筹，特别是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要求与高等教育中专业教育要求的统筹，既顾及两者的利益，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进而实现国家与个体的利益。

高考制度的这种“兼顾原则”，是高考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高考制度的一个基本理论，它表达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反映了教育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间断性之间的统一，实际上也体现了高考制度作为中等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与中介的基本定位，以及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两者之间的“交集”与融合机制的特点。因此，“兼顾原则”是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直接影响和评价高考制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或标准，忽略或慢待了任何一方，或者是由于错误的方式进行结合而“得罪”双方，都是背离教育规律的，必然会使得整个高考制度出现系统内“紊乱”，进而产生畸形或功能“失调”。

这种“兼顾原则”，实际上是评价高考制度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标准或原则。因为，高考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本身的结构是否恰当，无疑是评价其合理性的重要标准。而“兼顾原则”恰恰是调整高考制度内在结构的重要原则。显然，如果高考制度出现结构性问题，即使其中某一个因素或环节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结构上的优化则能够使整个系统中的各个因素或环节都分担或传递必要的压力，而不至于使某些个别因素，如高考，因承受过大的压力而变形。

“兼顾原则”的两种变量

高考制度的这种“兼顾原则”，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理论。作为一个随着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历史范畴，它直接受到两个“兼顾变量”的制约和影响。根据质量互变的辩证法理论与教育发展的规律，这两个“兼顾变量”，分别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和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就前者而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越高，规模越大，它在招生中的选择性越小，上大学的“门槛”越低，它在高考制度中的权力或影响的权重就越小；反之，它的权力则越大。同样，就后者而言，如果高中毕业生中上大学的升学率越高，比例越大，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直接的“交集”就越大；彼此联系越密切，那么，高中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就越大，进而在高考制度中的分量就越重，权力也就越大；反之亦然。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如同经济学中所谓“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关系及其变化一样。显然，这样两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高考制度“兼顾原则”的具体内容与实现方式。根据这两个指标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而确定高中教育相关因素与高等教育相关因素在整个高考制度中的不同地位，则是实现高考制度中“兼顾原则”的具体路径。

当前高考制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兼顾原则”，没有适当地体现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支持，特别是忽视和弱化了高中教育过程中各种评价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与功能。据省市考试院的有关领导和专家介绍，目前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功能，特别是在整个高考制度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名存实亡”。只有部分自主招生的大学，以及实行免试入学的部分高职院校会适当地参考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而一般院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虽然也有参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但一般都来不及看。它过去曾经作为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门槛”功能，现在差不多丧失殆尽。而在目前高考的命题与判卷中，主体也几乎是大学教师及相关人员。在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中，中学及其校长的推荐在选拔中的作用非常明确，但在考试规律、题目内涵、教育导向等方面，有些地方则与高中教育相去甚远，由此引发了一些不应有的问题和批评。坦率地说，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它导致了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断裂与隔离，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内在失衡，以及整个高考活动的错位。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高考制度中的这种结构性失调，还将直接影响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实施，甚至在实际上降低了基础教育的价值，扭曲了义务教育的功能。同时，这样的结构性失调不仅引起了高中教育及其相关评价活动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高等教育的“负担过重”。可以想象的是，当高等教育在高考制度中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时，它的“动作”不变形才怪呢。

如果说，在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在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升学率还非常低的历史时期，上述现象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现在中国高中教育发展的实际，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

已经使得两个“兼顾变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并由此赋予了高考制度“兼顾原则”新的内涵与特点，为高考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经过十几年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 24% 左右，比 20 世纪末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青年人上大学的门槛已经越来越低，高等教育的选择性从整体上也将逐渐减小。另一方面，虽然高中教育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张，但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升学率也越来越高。据有关方面统计，就全国范围而言，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已经达到或超过 75%，有些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升学率更高。这种变化也充分表明，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两者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日益增大。根据这两个“兼顾变量”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高考制度中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无疑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而这种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和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扩大和加强高中教育各因素在高考制度中的地位、权重与影响。实际上，近年来高考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高等学校的入学途径

按照“兼顾变量”的变化以及新“兼顾原则”的要求，我个人认为，高校的入学途径，在贯彻稳定与改革相结合的基础上，至少应考虑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申请入学

指的是高中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在相关高校申请入学。而且，这些选择申请入学的学生同时有权利参加考试入学。考虑到目前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提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其综合素质评价等在高考制度中的地位，并且切实加大它们在选拔中的分量或权重，是合理且必要的，也能够有效地促进高中的素质教育和高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建议在进一步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大学的实际，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选拔模式，实施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大部分普通大学 and 高职院校，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及其综合素质评价，可以直接替代高考的功能，成为大学选拔和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对于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重点学科，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及其综合素质评价，则是报考的必要门槛。

第二，考试入学

指的是考生按照自己的水平与意愿，根据不同重点大学的学科与专业特点，有选择地报考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学科专业。这些大学也应该充分尊重这些考生的自主权，科学地安排考试时间与空间，为考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象。鉴于中国大学之间的差异与多样化，以及教育公平的需要，建议部分选择性非常高的大学，特别是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包括部

分一般大学中选择性比较高的学科专业，继续实行统一的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考试，或者进一步完善已经实施的自行或联合举办的适合本学校或者某类高等学校特点的各类自主招生考试，包括目前的各种联考等活动。同时，切实重视和进一步完善与高中教育的联系，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其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高中阶段其他特色性评价结果，纳入自主招生制度，以利于这些大学对人才的选拔，以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三，推荐入学

指的是针对那些的确在某些方面具有天赋的学生，包括一些专才、偏才、怪才，以及确实展现出某种特长潜力的学生，通过公开、公平和公正的途径，实施具有诚信保障的推荐入学制度。作为一种专门人才的培养机构与教育层次，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大学应该为上述这些学生提供必要的空间与发展路径。这些学生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或者综合素质评价中，也许并不具有优势，甚至可能会名落孙山，但如果通过某种形式考查他们确实具有某些特殊的发展潜力，也是具有培养前途的。这种推荐入学的制度安排至少应该有两个非常重要并相互关联的边界条件：其一，他们只能是极少数人，在规模或体量上不影响整个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其二，一般而言，选择推荐入学的学生必须具备明显特质，进而在总体上区别于申请入学和考试入学的学生，否则便失去了推荐入学的意义。

高考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因素，有许多边界条件。同时，我们对高考制度的理论，特别是高考制度的规律性还缺乏深入了解和把握。本文只是在这方面的一点尝试，希望求得大家的批评。（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2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

熊丙奇：不要辜负学生对教改的信心

■ 熊丙奇

最近传出消息，南科大将自主授予 2011 年招收的首批教改实验班学生文凭，力争其“含金量”不低于并高于教育部统发文凭。该校还计划逐步实现“自授学位，自发文凭”，以此打破教育系统的“大锅饭”。

据此，有舆论分析南科大还在继续坚持推进“自授学位”的改革。但其实，南科大自主授予首批学生的文凭，这一改革已属于“过去式”，因为按照我国的学位管理办法，南科大的首届学生由于没有参加统一高考，将无法获得国家授予的文凭。这些学生四年求学毕业，只能获得本校授予的文凭。

在南科大今年获得招生证，并通过高考提前批招生 180 名学生时，就有舆论分析南科大第一届自主招生学生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否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笔者当时就分析，这批学生如果不补一个高考程序，是无法获得国家承认的学位的。他们能否获得国家文凭，取决于自身的意愿。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学生显然已经作出不要国家学历的选择。事实上，早在他们入学时，就已经抛开学历思想，追随南科大朱校长提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甘愿做教改的“小白鼠”；不然，他们不会放弃可以进体制内名校的机会，投身这场教改试验。此后，教育部曾要求这批学生参加高考——这其实就是补一个程序——但是这批学生都以拒绝表明决心。

从这些学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教改的希望。然而与学生的改革理想对比，南科大的改革走向却充满遗憾。在笔者看来，有这么多支持南科大教改的学生在，南科大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在乎体制内文凭的教改之路，这就是坚持实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我国的教改，不要辜负了对教改有殷切期望，且愿全心投入的师生。

去年南科大获得招生证，南科大的招生安排在提前批。虽然该校强调，这还是在进行自主招生，但了解我国高考制度者都明白，这根本不是自主招生，而属于按计划集中录取。南科大的办学至少在招生环节纳入内地传统学校管理模式，这也意味着，南科大在本科办学层次失去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可能。南科大称，还将计划逐步实现“自授学位，自发文凭”，究竟怎样实现，大家拭目以待。

其实，南科大是完全可以坚持走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道路的。

其一，该校的办学只要坚持“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必定不缺生源，甚至可以吸引到更多优质的生源。倒是纳入集中录取，其改革的魅力下降，对生源的吸引也在下降。

其二，只要作为举办者的深圳市政府，支持学校的改革即可。如果该校的办学定位就是举办“非学历教育”，那么，其招生，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就不必纳入计划内招生；其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也不必经过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其学历授予，就完全可以授予本校的学历——这种“非学历教育”放在国外教育体系中，就是“学历教育”。只要南科大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个性和特色，就可以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或许在最初几年，南科大的非学历办学对体制内的高校无法构成影响，但是，当南科大有首届毕业生，而且其毕业生的质量得到国外大学或者跨国企业认可时，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这批学生可以获得国外大学的认可，可以读研、攻博，可在我国，他们的学历却无法得到认可？这就会督促教育部门反思现在的国家承认学位体系，由此推动建立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证的新体系——这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打破教育计划体制的核心改革。

我国教育部门当初想把南科大首批学生纳入高考体系，就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这批学生没有被纳入高考体系，在毕业时，没有获得国家学历的他们定然会引发大家对学位授予、认证问题的关注。可是，他们身后已没有后来者，南科大的第二届学生、纳入高考体系，定然获得的是国家承认的文凭。因此，对首届学生的关注将十分有限，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南科大唯一一届打有改革烙印的学生。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缺民间力量的大力支持，这是推进改革的最好时机。如果把这一时机错过，未来再启动教改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会让公众失去对改革的信心，不像当初南科大还没有校园，朱校长一声改革就凝聚了那么多人气。如果日后某一天反思今天的教改，或许泯然众人的南科大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当初坚持原有的改革方向，南科大或已经实现自身的办学梦想。

作者：熊丙奇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2-12

“处长辞官从教”：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开启

11月，临沂大学8位处长加8位科长辞官从教，引发的不仅仅是“太反常”的舆论喧嚣。

“减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虽然临沂大学校方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一种阻力相对较小的改革方式，但仍然有人认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号来了。

曾高调改革却又销声匿迹的复旦大学，声称“即使不完善也要改革”的中南大学，还有突然爆出处长辞官从教的临沂大学，高校改革的步伐一直就在期待和争议中没有停下。

而几所高校的不同改革尝试，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面镜子，镜子后面，折射的是各种各样的改革思想和世态。

镜子里，还应该刻上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的一句话：“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减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

在发酵了十余天后，临沂大学8位处级干部和8位科长主动辞官从教的舆论余波仍未散去。记者一拨又一拨地找到王焕全。这位临沂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面露难色：“能不能不要再采访8位处长了，他们想静下心来做科研。”

外界的持续关注，出乎王焕全的预料。

实际上，临沂大学早在今年7月份就开始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竞聘，10月就已完成。3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切进行得平静而低调。

不过，这场旨在“导向教学、导向科研、导向高层次人才”的改革，因为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在消息公布次日便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

令王焕全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处长从教的新闻正巧与“国考”撞车，“很多报纸封面的头条新闻是临沂大学处长辞官从教，而下面紧跟的大照片是千军万马赶国考。”

在临沂大学内部，这场改革被视为“内涵提升”的一项重要举措，外界则将其解读为高校打破“官本位”的典范，甚至有媒体评价“这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号”。

在临沂大学人事处处长巩庆毅看来，外界的关注反映了深层次的改革难题——“高校官本位问题太深了，改革不好突破。”

临沂大学静悄悄地扭转了高校长期存在的“学术与官位倒挂”问题，校长韩延明的表态可见其改革决心，“所有干部都是为教授搬凳子的，而不是指挥教授搬凳子的。”

巩庆毅说，为引导高层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转向教学和科研一线，临沂大学大幅提高了教授津贴与教学、科研待遇，四级教授岗位津贴每月平均比处级干部多20%，三级教授比处长多40%，特聘二级教授岗位津贴比四级教授高5倍左右，特聘一级教授年津贴一般在150万元到200万元，贡献特别突出者可赠300万元的别墅一套。此外，临沂大学还为教授配备工作室，规格高于处长办公室。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双肩挑”被严格制止，凡担任教授特聘岗位者，一律不能担任正处级行政职务，“不能既要当官又要谋求学术利益。”

改革产生了预想的导向作用，原资源环境学院院长于兴修、原纪委副书记刘兆明等8位资深处长辞官从教，这直接带动了8位正科级干部一起辞职。

信息学院年轻的正科级干部胡顺波辞职后，被聘为特岗四级教授，月收入一下子比正处级干部巩庆毅多了1000多元。“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巩庆毅承认很多处长对这位年轻教授“有点羡慕”，但他并没有听到不满，“毕竟对于临沂大学来说，内涵发展是所有老师的共同愿望。”

尽管少有反对声音，但学校仍然表现得“异常谨慎”。巩庆毅说，最终形成的改革方案里，在增加教授待遇的同时，并未减少行政人员及普通老师的待遇，“存量不变、增量拉开、鼓励贡献。”他解释，方案吸收了其他高校改革失败的教训，避免改革进行一段时间后遇阻，“减少一个人利益的阻力比增加10个人利益的阻力要大得多。”

这位人事处长的改革感悟竟然暗合了中南海传递的改革信息。

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刚6天，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改革阻力，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

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会后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远在湖南的中南大学也正在进行一场“去行政化”的改革探索，不约而同的，他们也将存量利益优化作为减少阻力的重要手段。为此，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改革过程中多次强调，改革不整人，而且要讲情意，“如果我们改革让人饭都没有得吃了，那宁愿不改。”

相比两年前复旦大学高调推出却偃旗息鼓的“去行政化”改革，中南大学的改革新政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校一位老师甚至认为：“不仅中南大学需要这样一场改革，整个中国高校都需要这样一场改革。”

“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

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临沂大学的改革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也不会被贴上“去官本位”的标签。

“毕竟以前都是几十个教授争着干处长，现在一下子8个处长辞职当老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临沂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张洪高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却认为，不要看到8位处长转岗，就为去行政化叫好。他说，评价一所大学是否回归教育、学术本位，关键要看学校的教育与学术决策机制，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还是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决策。“就这一点而言，虽然临沂大学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但并没有看到这所大学对教育与学术管理机制进行改革。”

毕竟，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官，临沂大学改革也可以仅仅被看作“给人才开辟了一条业务通道”。实际上，临沂大学大幅提高教授待遇只是改革的第一步。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风云透露，临沂大学已经开始推进“教授治学”。临沂大学已逐步放权给二级学院、科研院所，“把决策权、发展权、财产权、人事权、资产权这五权都放下去了。”在王焕全看来，这需要相当大的魄力，“二级学院院长人、财、物的权力都有了，可以自行管理科级及以下干部。”

作为与此对应的约束手段，临沂大学计划在各个学院建立教授委员会，学院院长不兼任教授委员会负责人，包括申报课题项目、教授评价、评选名师等事项，都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决策。

为鼓励院长放权，校长韩延明主动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改由学校公认学术水平最高的一位教授担任。巩庆毅认为，校长此举树立了榜样，“为进行深层次改革减轻了阻力。”

临沂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设计已经启动，目前正征集老师意见。该校理学院教授傅尊伟向本报记者表示，教授委员会作为改革的制度性保障，必将触动行政领导的利益，“如果教授的看法和行

政领导不一致，就会产生博弈。”这位青年教授期待，教授的话语权能够得到肯定，“这能稀释官权，干不干处长就无所谓了。”

位列“985”高校的中南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与临沂大学多有相似。根据校长张尧学推行的改革新政，以后二级学院在决定人事、学术、资源分配事项时，不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授委员会。

为防止教授委员会变成小团体利益代言工具，中南大学还重新设计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规定教授委员会成员两年一届，届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样做的好处是，“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委员可能也会整你。”

但改革越往深处走，遇到的阻力也必然越大。

2010 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高调宣布制定大学章程，进行去行政化改革，但推行却十分艰难。

按照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设想，《复旦大学章程》将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他的改革同样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强化了这两个委员会的权威，它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只是，这一系列改革设想很快陷入沉寂。

面对复旦的“前车之鉴”，熊丙奇认为，相比“985”、“211”高校，临沂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相对容易，虽然“985 高校、211 院校的行动更具示范价值”。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谈及高校改革时曾说，寄希望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对大学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创新，并不现实。在他看来，名校缺乏改革动力，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导致它们的细微改革都可能面临巨大阻力。

而临沂大学这所更名不久的新学校，其相对不出名反而成了优点。张洪高分析，比起北大清华，临沂大学没有它们那么错综复杂的利益，“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很多。”

作者：吉祥 来源：齐鲁晚报 发布时间：2012-12-10